

DUKU

读库

0606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DUKU

读库

0606

主编 张立宪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 0606/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80225-185-0

I. 读… II. 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2959 号

读库 0606

责任编辑: 刘 刚

装帧设计: 艾 莉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开 本: 645 × 925 1/16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25-185-0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DUKU0606 · 目录 ·

01-66	国宝南迁记	那志良
67-72	隔海故人来	朱传荣
73-84	一部抗战歌集的诞生	阚培桐
85-100	《救亡之声》抗日歌曲选	阚培桐
101-117	毕业生	张妩丹
118-128	家师逸事	张 梅
129-140	乐坛 1994	秦 峥
141-154	航母战记	杜 嘉
155-179	情迷小人书	杨 欢
180-187	红岩上，红梅开	孙 洁

188-194	春日读唐三种	沈胜衣
195-198	吕文德评传	老 六
199-236	声音	苗 炜 / 辑
237-244	语词笔记	
	2006 年度语文	黄集伟
安东尼奥尼与《中国》		侯宇靖 刘海平
246	序	孟凯帝
255-265	大师已近 中国已远	侯宇靖
267-277	我与《中国》	安东尼奥尼
278-284	恩丽卡：我那时花枝招展	
286-294	卢奇亚诺·都沃里：我们为中国做了件很重要的事	
295-298	孟凯帝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中国	
299-317	《中国》旁白	

■ 国宝南迁记

■ 那志良

国亡有复国之日，文化一亡，将永无法补救。

文物南迁时期

文物装箱

1931年9月，东北发生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大家明白了日本的野心，是想先得到东北，再向南侵，平津一带如果发生战事，故宫里这些国宝，就有危险了。当局认为必要时，应当把这些文物迁运到安全地带，现在就应当准备，就装了箱，紧急时搬运着方便。

说办就办，故宫博物院开始准备起来。院中主持人们的打算是：

- 一、箱件不必用新箱，买那种装纸烟的旧木箱就可以了。
- 二、棉花可用黑棉花，就是那些旧棉衣、棉被拆下来的，再经弹过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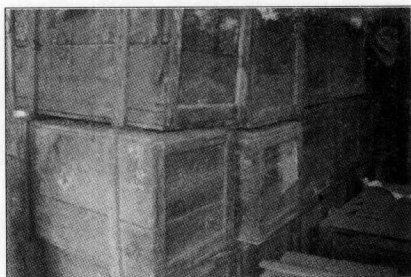
次的棉花。

三、同仁没有装过箱，万一装得不好，运出去后都打碎了，如何交代？决定找那些古玩行里专装出口文物的工人来装，比较放心。

谁知这三个办法，都有毛病。

第一，那些装香烟的旧箱，本来就不稳固，木料很薄，文物装进之后，晃晃动动，颇有危险。

第二，旧棉花已没有弹性，失了用棉花包装的原意，而且装的时候，棉絮满处乱飞，味道难闻。一位同事告诉大家，这叫“回笼棉花”，是用



国宝南迁时的包装箱。

穿过的棉衣、不用的垫子，甚至婴儿尿垫，再经弹过，人家只是用它做垫子，我们怎能拿来包宝贝？

第三，那些请来的装箱工人，到此摆着专家的姿态，拿很高的工资，时常用教训的口吻和我们谈话。有一次他们拿起一块剑上饰玉的“剑首”，举起来，问我们：“你们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？”不等我们回答，接着又说：“这叫压脐，是埋葬死人时，放在肚脐上面的。”

我们实在忍不住，大家去找院长（易培基院长，编者注），请求三件事：

一、用这种箱子装古物，大有破碎的危险，我们对文物的安全，无法负责。

二、旧棉已无弹性，对文物安全，失掉了作用，而且装箱人受不了，健康有了影响，主张改



包装箱局部。

用新棉。

三、装箱工人的装箱方法，没有什么特殊技巧，我们已都学会了，以后改为自己装，不必叫他们每天张牙舞爪地胡说八道了。

院长听从了大家的意见，叫我们把那旧箱移交给图书、文献两馆，他们装书籍、档案，使用旧箱，没有破伤的危险。并规定新箱的尺寸，一律定为长三尺，高宽各一尺五寸。棉花改用新棉。装箱工人，也一律辞退，改由自己装箱。

我们的装箱，真有一套办法呢！主要是一个“紧”字。我们看以前江西景德镇进呈的瓷器，他们用木桶装运，桶里的瓷器，他们把十个碗用草扎紧，成为一个整体，一点也不摇动，放在桶里，每束之间，又用谷壳把它们隔开，塞紧，使它们毫不松动。运到北平去的瓷器，没有破碎的。他们并不用棉花，都有这种成绩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我们把每件瓷器，用棉花隔开，分别包扎起来，再入箱中塞紧，是不会破碎的。

三馆——古物、图书、文献，装箱情形，他们都认为北平有作为战场的危险，尽量把重要文物装了箱，抱着设法减少箱数、增加件数的心情。例如吴玉璋先生装的铜器箱，后来在上海开箱检查时，把铜器搬出来核对后，再装回去时，装不下了。拿出来再重装，仍是不能把所有铜器装进原箱。大家在那里抱怨，当时何必装这许多？而不知原装箱人是一片好心。

我装的玉器，也是如此。我想，若是把那些“玉山子”等非常沉重的玉器，与那些玲珑剔透的玉件装在一起，玉件会有破碎的危险，我把它们分箱装，而且都装得满满的。在北平工人抬运的时候，就有人在那里骂，为什么把重的东西都集中在一箱呢？

图书馆的书籍，文献馆的档案，他们也是装得满满的。

惟有秘书处的箱，不是如此。秘书处那时的权责很大，所有宫中文物，在各馆没有把他们应当保管的文物提走之前，一律由秘书处保管。我们装箱的文物，都经过我们写过提单，提到我们馆中才能装箱，他们不必经过这手续，可以直接到各宫殿去装。那些职员，对文物、图书、文献，一概不懂，叫他们装箱，就有应该装的不装，而那毫无价值的东西却装了箱，例如他们装的有黑折扇若干箱，那是毫无价值的东西。

他们却会争取好的成绩。例如他们装花盆，都是些盆库里面没有什么

价值的东西，他们进去时，叫工人抬十几个空箱进去，在院中排成一行，叫工人进去搬花盆，每箱中放两个，用棉花、稻草塞好，在每个花盆里垫上些棉花，又进库去拿小花盆，放在每个大花盆之中，然后塞紧，钉好加封，十几个箱子，用不到一个小时，大功告成。他们的一组，至少有十几个箱的成绩。

我看到他们有七八十条数珠，都是檀香、沉香、菩提子之类穿成的，这些装在一个箱里还觉得太松，他们却分装三箱。

三馆哪有这样快，尤其是我们的古物馆，每件文物，都要仔细捆扎、包好，半天的时间，平均一二箱的成绩，已经不错了。

结果下来，各馆处的所装箱数，是：

古物馆 2631 箱

图书馆 1415 箱

文献馆 3773 箱

秘书处 5672 箱

总计是 13491 箱，秘书处所装几乎占了半数。

文物起运

文物装箱，装了不少，始终没有起运的消息。1933年1月，忽然传来通知，说明天开始装火车，叫押运人员准备。那时，古物馆方面所派押运人员，是我与易显谟、吴子石、杨宗荣。

我们接到这个任命之后，有了不少的麻烦。有时有人打电话来，指名要找哪个人，然后问：“你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？”然后又接着说：“当心你的命！”又有人说，在起运时，他们要在铁轨上放炸弹。家里的人劝我辞去这个工作，我告诉他们：“他们是吓人而已，怕什么？”

外面反对迁运的声浪，一天比一天高，政府虽然百般解说：“故宫文物，是国家数千年来的文物结晶，毁掉一件，就少一件，国亡有复国之日，文化一亡，将永无法补救。古物留在这里，万一平津作了战场，来不及抢运，我们是不是心痛？”尽管你怎么说，没有人听你这一套！政府并没有灰心，仍然积极地筹备起运。

1933年2月4日，得到确实消息，准备2月5日夜间接车，2月6日

起运。

为什么要夜间装车？第一，那时的谣言太多，倘若真的有人破坏，后果堪虞。夜间，街道上车马已经不多，而且可能用戒严法肃清车辆、行人。第二，车站上夜间没客车开进开出，容易维持秩序。

2月5日的中午起，大批板车开始拖进院里来。这板车是当时很受欢迎的货车，用人驾辕，用人推拉，而载运量比马拉的车，少不了许多。

利用了些时，把车装好，车待起运。

天黑了，警察局来了电话，说外面已经戒严了。于是车辆开始移运，一辆接一辆，陆续而行。我们这些押运人员，坐着警车，赶到车站去，准备装车。车行在路上，显得非常寂静，除了车辆之声外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唱歌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。

板车卸了货，又赶回去装运，一夜之间，把两列车装满了。我们点清了每车所装箱数，封锁好了，才回到车中休息。

两列车上，各挂一节二等车厢、一节三等车厢，备押运人员及警卫人员乘坐。这一批押运总负责人是秘书吴瀛。车行路线，是由北平西站出发，沿平汉线南行，到郑州后，改循陇海线东行到徐州，再沿津浦线南行到南京浦口。

火车到站停下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下车看看封锁情形。

车到了浦口，吴秘书下车过江到南京去了。我们就在浦口等他。

第二天他回来，我们问他，箱子是卸在哪里。他说：“政府还没有决定呢！先把列车调到边地去停下来，等候政府指示，过几天他们才开会呢。”

我们都笑了，说：“这不是抬着棺材找坟地！存地未定，为什么不等了再运？”

我们这几个人整天无聊，悔不带些书来。起初，在浦口逛街，后来，发展到下去。好在渡江的轮渡不要买票，每天可以多次往返。

过江的轮渡本来是要买票的，几天前，吴稚晖先生渡江，坐在船头，查票的人问他要票，他一声不响，查票的人生气，打了他一巴掌。这下子可惹了麻烦，查票人受了严重处分，以后过江之人，只要戴着证章，一律不需买票。

下关有块场地，许多卖艺的、唱曲儿的，在那里表演。易大哥对那位唱曲儿的小姐颇有兴趣，我们也就随着他天天去听。

每日三餐，早饭、晚饭自理，中午四个人一同去吃天津馆，那里的活鲤鱼很好，今天吃糖醋，明天吃红烧，渐渐也吃厌了。有一天，我们找到一家很老的餐厅，见他们用“簋”来盛菜，很有古意，可是我们打开来看时，上面放了一个盘子盛菜，簋腹中是开水。

一直到3月中旬，政府才决定把古物、图书运到上海，档案暂存在行政院大礼堂。

招商局派了一艘老船，名字“江靖”，载运这些图书、古物到上海，那些档案也运到行政院大礼堂去了。

驻守在上海的同事，上了船后，派人把我们送到库房休息，由他们看管箱件。到了库房，我们看到那是一座七层大楼，水泥钢筋建筑，颇为宽敞，在最下一层，隔出一部分房屋，作为办公及驻守人员居住之用。库房四周，不与其他房屋相连，是一个适当的仓库。

第二天卸船，看到码头工人，一个个排成行列，依次背箱，不管轻重，每人背一个箱子，鱼贯而行，秩序井然，令人佩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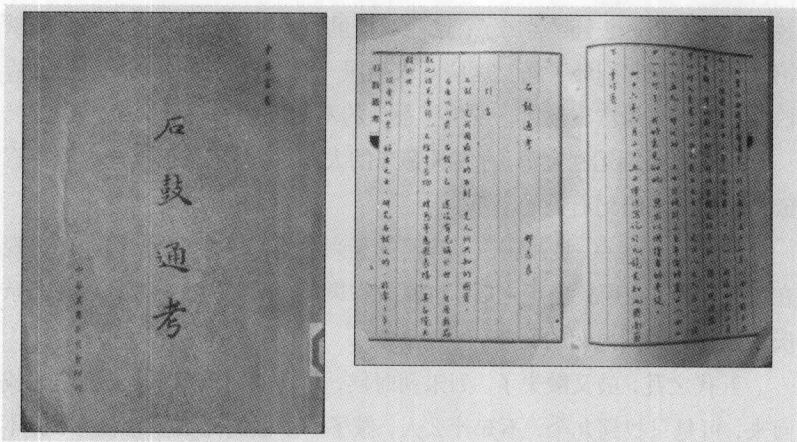
初到上海，觉得事事新奇。我们走在街上，可能被人看出是初到上海的乡下人，被人跟踪了，不然，何以吴子石先生进布店买布，一转眼工夫，钱包就不见了呢？大家觉得这里不可多留，停了数日，便赶回北平了。

石鼓装箱

石鼓是人人知道的国宝，一向存在国子监，由市政府保管。他们看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在准备迁运，古物陈列所也有同样的准备，他们这十个石鼓，是不是也要做这个准备呢？

他们想，若是凭他们自己的力量，无论技术方面、经济方面，都是问题。他们想了一个好办法，交故宫博物院代运。这个办法真是不错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是研究石鼓的专家，以前的人都说石鼓是周时之作，马院长则主张是秦时之作，而且他写过一本书叫《石鼓为秦刻石考》，他并且主张这石鼓并不是“鼓”，应当名为“刻石”。

现在，石鼓要交他代为运走，他自然乐于接受的。



那志良所著《石鼓通考》一书，出版于1958年。而他对于石鼓的研究，则始于文物南迁之中。

石鼓十个，每一个的重量，约一吨左右，鼓上的字，是在石皮上，石皮已与鼓身分离，敲起来有“砰砰”之声，装运之后，如果石皮都落了下来，只存石心，那还有什么价值？

反复思索，终于想出一个主意。

购买一些“高丽纸”，先用水浸湿，然后覆在石鼓面上，用棉花按捺，使纸张接近了石身。这种高丽纸的棉性很牢固，按进字口，不会断裂，湿的时候按进去，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，等于是把石上的字，贴紧在石身上了。

然后把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。棉被外面，再用麻打成辫子，围绕在棉被下面，缠得紧紧的。做些个厚木板的大箱，把石鼓放在里面，四面再用稻草塞得紧紧的。箱外包上铁皮条。

这个办法是成功的，以后屡次开箱检查，都没有新的伤损。

它们是随着第四批文物运到上海的，放在天主堂街库房的最下层；文物运京的时候，也随着其他文物，一同运京，也是放在库房的最下一层。文物向后方抢运的时候，工人是以箱数计价，谁搬这沉重的大箱？幸而马院长有手谕，告诉在那里发箱的人说：“石鼓必须运出。”于是给工人加了钱，把这十一箱（其中一箱是碑）运出了。又因为码头装船，恐有疏虞，把它们一律运往车站，装入火车了。

发箱人不知马院长的用意，以为他是叫大家运大箱，于是把文献馆所

装的戏衣大箱，也一起运出了。这些戏箱里面都是些破旧戏衣，当时文献馆为什么也把它们装了箱？这些戏衣箱照一般的戏衣箱一样，都是凸盖，西北运输，是用汽车载运，发生了很大的不便。

这些石鼓箱运到宝鸡，存在关帝庙的大厅里。马院长何以这样重视石鼓？我们不妨略记石鼓的沿革。

石鼓出土地点，是在陕西凤翔府的天兴县南二十多里的田野中，是现在凤翔之南。在唐代出土之后，也就放在凤翔，不大为人注意。后来郑余庆才把它们搬到凤翔的孔庙。

五代之乱，鼓又散失了。到宋朝时候，司马池知凤翔，才又把它们找回来，可是只找到九个，不知什么人，做了一个假的充数。到宋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向传师发觉了，叫人再找，居然找到，上半段已被人磨去，改成白形。这就是第十鼓的“作原石”。现在所存的十个鼓，这鼓仍然是白形，铭文中第四字以上没有了。

宋大观间，石鼓由凤翔运到汴京，就是现在的开封。金人陷汴京，石鼓被运往燕京，起初不甚重视，到了元仁宗皇庆二年（1313年）才把它们放在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的左右。从那时起，经过明清两代，再没有移运过。

这次的迁运，主其事的马院长，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中也记载此事，说：

二十二年春，榆关告警，北平古物，多数南迁，此石亦在议迁之列。余适董其役，得以摩沙而审辨之。石质坚顽，审为花岗岩，其剥落之状，异于常石，乃石皮受风雨寒暑之侵蚀，渐次与石骨分离，日久则脱落一层，石骨暴露，十石如出一辙。存字之处，石皮完好，亦有已分离而犹未脱落者，扣之则其声虚廓而不实，倘遭外力之压抑，可即时脱。当靖康之际，剥落程度，虽不若今日之甚，已入于此种状态……其损字原因，必系北徙之时，修纆大索，长途挽致，遂使石皮脱落可断言也。自虞集潘迪以后，至于今日，皆在孔庙大成门左右，有大厦覆盖之，有疏棂扇镬之，保护不可谓不周，然五百年来，又损五十余字，皆分离之石皮，经推拓而脱落者也。余鉴于此种情状，及既往之事实，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。乃先就存字之处，糊之以纸，纵使石皮脱落犹可黏合，次乃裹以絮被，缠以纆纆，其外复以木箱函之，今日之南迁，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。

石鼓上的字数，明安国十鼓斋所存三份宋拓本的字数是：

中权本 500字

后劲本 497字

先锋本 480字

清盛昱的精拓本，只存310余字了。

明安国所藏之本，是非常可贵的。他谆谆告诫后人，不要把它们鬻质、假借与投赠。他仍不放心，把这十鼓斋中十份拓本，缄藏在一个瓮里，放他家天香堂梁上。到了清道光时，其后人拆售天香堂，被人发现，现在已悉数归诸日本了。

所幸这重要三本已然被国人影印出版：

先锋本，附印在郭沫若所著《石鼓文研究》之后，并附有《先锋本夺字补》，凡21字。拙著《石鼓通考》也附印了此本，并将各鼓阙文，根据中权、后劲两本，予以补入。

中权本，上海艺苑珍赏社有影印本发行。

后劲本，上海中华书局有影印本发行。

石鼓自南京运到宝鸡，就由我保管。后来运到峨眉，在武庙库房西配房中存储了它们，我就在这配房中辟一小室居住，整天看着石鼓，临写石鼓文，搜集石鼓资料，一直到运回南京，还是我押运汽车十辆，经湖南、江西运去的。我在台写了一本《石鼓通考》，由“教育部”代为付印出版。

易培基盗宝案之发生

故宫里有不少没有用的东西，例如茶叶，在七间大殿里，堆得满满的，故宫已拟了出售计划。另外有布匹、绸缎很多，当时也决定出售。因为没有人肯整批买去，就由理事会自行在理事会零售。规定出售日期是星期日。

据说有一天，不是星期日，理事张继的夫人陪着几个朋友到故宫参观，剪票的人问她要票，她说：我是理事张继的夫人。剪票的人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到秘书处找人陪你来吧！”

张夫人一气，不参观了，顺路散步往理事会走。一走进大门，看到有人在那里买布，其中也有秘书长李宗侗先生在内。李先生隔着玻璃看到张

夫人，吓得由后门跑了。张夫人进得门去，问留下来的人说：“今天不是星期日，为什么你有特权，在今天买布？我非检举不可。”这些人说：“今天是整理，不是出卖。”张夫人不听，气哼哼地走了。

最初，只是检举处分故宫物品有舞弊嫌疑，后来不知怎样，弄成“易培基盗宝案”了。

这里面有什么恩怨？有什么政治问题？当时院里议论纷纷，我不知内情，不便多说。演变成“盗宝”，已是文物南迁完毕，易院长辞职，马院长就职后。

那时，易培基院长的女婿李宗侗，也是院里的秘书长，曾命秘书处派人装过二十箱珠宝南迁。这二十箱珠宝，是法院特别注意的，决定要到上海检查这二十箱。

我当时在上海工作。院长来电，叫我负责接待法院检查。

检查对象，是院长易培基及秘书长李宗侗。这案子的检察交由江宁地方法院办理，另由最高法院派检察官莫宗友主持。

我们在天主堂街库房第四楼外面，摆起一行长桌来，大家坐在长桌的一面，一行排起。第一个是莫检察官，第二个是江宁地方法院推事，第三个是书记官，第四及第五是珠宝鉴定人，第六个便是我。

每提出一个东西，由院里的人交给我，我转交给鉴定人，鉴定人报出名称、件数、材质、附件来，书记官一一记下来，再由我交还本院同事收回装箱。

如果有一件东西是假的，或与账册不符，就要把它另封起来，认作是易培基掉换或偷去的。

我们相处得还不错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很快的半天就过去了。可是，当时也有些争执。例如有一次，一个包里有四粒小珠，账册上是五粒，他们说，赶快登记起来，偷了一粒。不久，在同一箱内，又有一包小珠，账册上是四粒，实际上是五粒。他们没有记下来，我主张也记下来。莫检察官不肯，说可能账册写错了，只有人从公家偷东西往家里拿，哪会有从家里拿东西放在公家的？我又问他：“有没有包时错乱的可能？”他说：“在法律上的观点，每一件事不能与另一件事混为一谈。”我不懂法律，不必多言。

鉴定人也有搞错的时候。有一次，一件红碧玺，他报成红宝石，我看他是错了，请他再拿去看看，他仔细一看，说：“我说错了，是红碧玺。”然后他回过头来问我：“贵宝号是什么字号？”我想我们相处这许多天，难道他还不知道我是故宫博物院的人吗？我就说：“我们的小字号，是故宫博物院。”大家都笑了。

后来一位同事向我说：“看来你也是珠宝专家呢！”我说：“还不是这天跟他学的。我不指正他不成，他们写成红宝石，就算定了案，将来他们向我们要红宝石，怎么办呢？”

经过不少日子，这二十箱总算检查完了。令人不满意的事也太多了，不需一一详述。总之，他们专为找麻烦而来，找不到麻烦时，他们把不麻烦的事，也列为麻烦罢了。

检查完珠宝，又检查书画，这东西改由别人经手，我只好不闻不问了。

这个工作，是1934年开始的，一直到1936年4月，都是在上海检查的，1936年5月到8月在北平检查，1936年9月到12月又在上海检查，总计被法院另封起来的，书画594号，铜器218号，铜佛101号，珠宝很多，手边没有资料，不知其详了。

这个案子，主要人物虽是易培基及李宗侗，而实际受害最深的，是萧襄沛与刘光谔两先生。

萧襄沛是湖南人，在秘书处做科员，奉命去装珠宝箱。他是一位老老实实的人。这次检查的重点，是这二十箱珠宝，他是经手人，自然难逃这场官司。有一天，工人上楼来报告，说有一位检察官要见我和欧阳道达主任，我们就下楼去见他。他们拿出传票，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江宁地方法院的，是要传萧襄沛到法院。

我马上到楼上去找他，请他马上到会客室。等了许久，不见他下来，我又上楼去催时，看到他跪在佛前祷告呢，满头大汗。我看过这种情形，心里很难过，但又不能不催他。他下楼后，就被检察官带走了，被扣押起来。

在看守所住了很久，总不结案。他的太太带着孩子来看他，住在对面对客栈里。住得久了，带来的钱也用完了，想要回去，旅馆的人告诉他，你打的是冤枉官司，不久自然解决，我们愿帮你的忙，多住些天看看有无结

果，又住了几天想要走时，旅馆的人要他结清账目才能走，等于被旅馆扣住了。后来托人在亲友处借了不少钱，他们才得离开镇江，家里穷困得不得了。

萧先生的案子，终于开庭了，找不出他什么伙同盗宝的证据来，找一个问题问他，乾清宫那顶帽子，上面有一颗珍珠，你们把它拆下来，装了箱，是谁的主意？他不知推脱，反而说“组长自有权衡”。法官因此判他毁坏公物罪，所判刑期，正好抵清他在看守所拘留的日数。官司是结束了，家庭弄得破碎不堪。

那位刘光谔先生，更是可怜，他托了人，好不容易进了故宫，被派到秘书处工作，又被派与萧先生一同装珠宝箱，也被法院传去，在看守所住了许久，也被判了刑，做事的日数，还不及打官司的日数长。同事都说这是命里注定的。

新官上任

易培基院长因为发生盗宝案，辞去了院长职务，1933年7月理事会开会，把这事通过了，并决议请马衡先生继任院长。院长之外，加一副院长，由徐鸿宝先生担任。各馆的馆长也决定了：

古物馆 马院长自兼

图书馆 袁同礼

文献馆 沈兼士

文物运到上海之后，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办事处，由欧阳道达先生担任主任。

马院长就任不久，就有电来到驻沪办事处，叫我马上回北平。我不知道什么事，只好遵令动身。到了北平，才知道叫我担任会计科的“现金出纳”。

我实在不愿做会计方面的事，我一无所知，怎能负这样大的责任？去向院长恳辞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很紧要的业务，必须找靠得住的人担任，在他未找到适当的人之前，叫我勉为其难。我告诉他，我做一件事，总希望做得好，这会计方面的事，我一窍不通，一定做不好，那时不是对不起院长？最后商定，仍是由我代理，以两个月为期，找到妥人，立刻交代，